

扎實嚴謹的治學精神

——為張國禎《同新文學先行者對話》序

謝冕

張國禎是王瑤先生的博士生，他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只不過他是博士生，我當年只是本科生。論輩分我比他高，論學歷我比他低。張國禎在北大讀博時，我還沒有退休，我們先後聽導師的課，先後接受導師的指導。當年北大研究生少，他們的待遇與老師基本相同（都是紅色校徽），說我們是同學、是同事，均可以，但更確切地說，是同門。這樣說，我有點心怯，因為王瑤門下精英輩出，我是有點「僭妄」或「攀附」的味道了！認真地說，我和國禎走得近，並感到親切，不僅由於學術，乃是我們同是福建人，同門加上同鄉，可謂親上加親。從這點說，國禎要出書，要我寫點什麼，說些什麼，於情於理都是應該，至於所言或深或淺，那就另當別論了。

《同新文學先行者對話》是一本學術著作，是國禎長期研究、觀察，費盡心力逐篇寫作、輯彙而成的一部書稿。王瑤先生門下有許多學者，他們秉承了導師的治學特點，重案頭工作，重材料的梳理和掌握，扎實嚴謹，不務空言。這一特點，國禎是認真地傳承了，我們從他的論文中可以看到對於王瑤先生治學精神的融會貫通。國禎此書的每一篇都是扎實嚴謹的精

心之作，從這點看，他是無愧於導師的。但在這裏，我要鄭重提出他有別於同門學者的另一突出的特點，即他的著述的現場感。

國禎在修博士學位之前曾經長期從事記者和編輯的工作。他的多數學術成果是與他的這種特殊身份相聯繫的，他將這種經歷轉化為他的治學特點。這本著作的名稱《同新文學先行者對話》即標顯了「訪談」、「對話」的特性，他的學術訪問和綜合不單純是在案頭進行，更確切地說，是在他的案頭工作的基礎上，在「行動」中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完成的。諸如：〈1984年丁玲訪談錄〉、〈1985年沈從文訪談錄〉等都是這種「親歷」的結晶。他的這些工作是他人難以取代的。說明白些，他在訪問之前對訪問對象必須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和體認，他事先擁有對於訪問對象的系統把握，在此基礎上的提問和討論，則無一不是「預設」的，也無一不是「有的放矢」的。

從這點看，國禎的學術才能不僅限於一般的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的那種固定流程，他的研究工作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優長，他與這些「先行者」的對話，絕非空谷來風，而確是心有靈犀。他是一位首先在書齋中勤奮工作，而又在「田野」上奮力探求的學者，他是一位真正走出了象牙之塔的務實的學問家。我注意到文集中他與丁玲的訪談，則凸顯了他這一獨特的優勢。從初見到作家的欣然約請，其過程非常動人，是國禎的真誠獲得了被訪者的信任，他於是取得了成功。「丁玲夜訪胡也頻故居」於是成了一篇宏文，也成了一段文壇佳話，甚至可以

說，這篇力作是這位為革命文學奮鬥了一生的傑出作家的絕唱。

除了以上所述，我從國禎的文集篇目中看到他的治學真諦，他的學術視野開闊而博大。可以說，他在做這些看似獨立的寫作時，一部莊嚴豐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已然深藏於他的視野之中。魯迅、郁達夫、廢名、張恨水、沈從文、蕭紅、徐訐、張愛玲，直至汪曾祺，都是國禎研究和探討的題目，這些作家的言說和行止，在他的筆下都是珍貴的歷史畫面的生動再現。

2026年1月1日
於北京昌平北七家

前言

新文學的召喚

1970 年代末我從東北調回親人身邊，到福建電視台上班不滿一年，就在恢復考研集結號聲中糾結。覓路打聽，在未盡復原的樂群路 14 號半壁房裏，尋訪到福建師範大學現代文學名宿俞元桂先生。質樸平易的俞先生，對我想讀研又兼有創作之想未加告誡，而說研究現代文學的人要懂創作，應該會寫，問我都寫什麼體裁的作品；然後介紹他近年在主持現代散文史研究，帶研究生的方向則不限於此。翌年秋起，俞先生成為我學習現代文學研究的入門導師，我師事俞先生，充分領略了什麼是文學研究的包容開放，什麼是新文學的代際賡續。

讀研第二年，俞先生調動自己多年在學界的人脈資源，為我們邀請了中外近現代文學界從中年骨幹到耆宿專家，接踵不斷來做專題授課、學術講座，這在福建師大之前是少有的。我們得以在高起點聆教。我自選題寫的頭兩篇論文之一——〈郁達夫和我國現代抒情小說〉，請前來講學的南京大學知名學者陳瘦竹先生審閱，方正不苟的陳老先生譯介過諸多西方戲劇名著，特地向俞先生和我對拙文作深入好評，重在肯定翔實的尋源考證和文學評價的準確。前來講學的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林非老師，不僅講魯迅研究成果，更傳授文學研究方法。難忘嚴謹

學者的啟示，是必須溯源尋本，深入根脈研究新文學。我以為在現代作家裏，魯迅和郁達夫具有長久的多維度研究空間。

1980年夏我向俞先生匯報提出，暑期想自費到滬查資料和尋訪在寫《郁達夫傳》的達夫三子郁雲，俞先生立即首肯，逕自幫我從已故的廖元善先生家要到郁雲地址並打了招呼。原來郁達夫當年在閩將郁雲寄託的友人，就是留日同窗、俞先生在福建協和大學的老友廖元善教授。暑期我在上海圖書館連日查閱研究資料後，在福建中路195弄層層疊疊又雷同的民宅尋找，見到酷似達夫、文雅謙和的郁雲，郁雲回憶他九歲在福州時抗戰爆發，父親決定赴南洋從事抗日救亡，和他講這一去會有很多危險，不為外人所知；他說當時對父親明知危險而勇赴國難印象至深。我們成了交流無礙的忘年交。因此我有了1985年赴富陽紀念達夫逝世四十週年會的經歷——那是作家同仁和研究者最呈現歷史現場感的學術盛會。

由作品及人，深探歷史現場，得窺新文學門徑，是感悟之一。作為生長於20世紀後半葉的研究者，難忘先行者的感召，以論文啟動與前輩對話，並在時空延展中，力求與長者溝通，體驗感受交流。本書的輯一「先聲與思潮」、輯二「文本與現場」，彙集論文和訪談錄，都以研究文章置於前，以相關訪談列於後，著意形成對話的體例。

現代文學的上下限，如王瑤先生所言還在兩頭拉伸，作為重心的三十餘年（新文化運動起，至1940-1950年代之交），我

感覺亦可分前半期和後半期；30年代中期之前，五四時期的是開拓者，而整個前半期進入新文學嶄露頭角的，我認為都是新文學前輩先驅；中線之後成長的作家如蕭紅、張愛玲，多為現代文學成熟期創新者，以史觀之亦屬先行者。本書的輯一、輯二，即以此為依歸。

我的碩士論文定題抒情性鄉土小說論，1981年在南北各大圖書館查閱巨量民國文本，細讀存量最多的沈從文作品。在首都圖書館，我借閱發現沈題「給思成、徽因惠存」的良友公司版《從文小說習作選》一書，其難得可貴處，在於從文手寫詳細自註標記，亦有當年認真的陳述自白，印證了新文學先行者對其人文取向和藝術路徑的重視。而1984年我在福州對老作家丁玲作三日訪談，劫後澄明的長者丁玲，對半世紀文學歷程清澈回望，表現出前輩先驅的從容和對後來人的寄望，實令人難忘。1985年我到北大，得樂黛雲老師提供沈從文出院信息和住址之助，登門拜訪沈老先生，一席訪談亦半世神遊。今年初在首圖再度尋到館藏沈贈梁、林書等原書，更得以確認歷史時空裏的文學軌跡。

兩次重要文學訪談，都是我讀研畢業，被調返省台做電視劇編創時進行的。新文學的召喚和個人的嚮往並未中輟。畢業後到樂群路看望俞先生，先生給我看新文學研究開拓者之一任訪秋先生評我論文的讚文，「新文學賡續終必有人」之語令人感動。有《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劉三姐》等名作的導演蘇里，退休後來福建電視台本部門為顧問，一日獨對我語：「看了你桌

上那本打印書（碩士論文），寫得好，很有價值，你應該繼續去做……」

80年代是人們展開想像力和追求理想的年代。

時我遠在吉隆坡的侄女給我寄來新馬版郁達夫作品及獲諾獎作家作品剪報，還有最新的三毛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雨季不再來》；又有友人提供海外版張愛玲作品，均助我擴展文學視野時空。1986年我向華僑大學提出「建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建議，被採納創建研究所。我被引用最多之語：「張愛玲是一位將西方現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領和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筆法奇特地結合的高手」，出自我1987年對張愛玲啟悟小說的評論。

1988年我考回北大讀博。導師王瑤先生，是新文學史開山奠基學者，在古今文學研究領域皆有扛鼎力作。王瑤先生初見面即指著案上我碩士論文說：「你以此擴展可成博士論文」，後又說：「四五萬字可也，畢業後可再以此題寫書」。此後先生授以學院派研究之道。新文學作品何以傳世？我屬意探討20到40年代小說美學歷程，期對現代作家表現人性的意涵和路徑，作更深入研究。歷多事之秋，王瑤先生1989年末在滬病逝。那個寒流突降江南燕北的黃昏，本人當時記述如「深夜行車十字路口指示燈驟滅」。1991年畢業季，我再辭北大而入媒體。

復入媒體的90年代初，我在京主辦一國字號新報文學副刊，每日從北三環乘車一個多小時往京西上班，和同仁堅持文學耕耘。看著河畔煙柳漸綠，道旁高樓拔節，不期然而至

的是，團結短暫沉寂的作家、建立文學園地的收穫。讓我連接研究與創作事業的代表者，是跨越現代與當代文學的作家汪曾祺。1990年在讀博的我曾向半世紀前進入文壇的汪曾祺，就40年代我國小說創作美學歷程之題，做過難得有默契、有深度的文學訪談。在耕拓檢察報副刊文學園地的過程中，得到汪曾祺、王蒙等多位作家積極支持。汪曾祺對文學的見解對我啟示良多；他在創作評論、眾多作品中對現代人性與歷史文化的明慧觀照，成為我壯年後從事現代人文傳播、繼續新文學事業的一束亮光。本書輯三「源流與蹊徑」，乃憶新文學良師治學傳承，及本人求索問學路徑之文。

本世紀初，我退休離開京城現代樓宇森林，在江寧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綠茵廣闊的校園，讀書整理文稿，汲水澆菜種瓜，體味王瑤先生和汪曾祺先生所描摹境界。間或開公選課，自選題講抒情小說和新詩，文學佳著改編影視劇之創作，講新文學誕生百年，仍重創作主體和文本解析，重文體發展。北返兩年後編本書，收入現代抒情小說名家課的頭兩章，即將魯迅和郁達夫創建抒情小說貫穿，而以汪曾祺作為跨越現當代抒情文學名家收官。

新文學，永遠在靈犀相通處召喚！



2026.01.16. 於望京